

近代以来曾国藩的形象演变与知识生产

李稳稳

摘要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初，在革命者的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曾氏被视为维护满族统治者的“汉奸”“民族罪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民党高层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积极推崇儒家传统文化，曾国藩的形象一度翻转成为传统文化“卫道士”。40年代，为反击国民党别有用心地塑造、宣传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延续清末民初的民族革命史观，将其再度批判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汉奸刽子手”。而海外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评价有所不同，但总体倾向于将曾国藩标榜为“中兴大将”及“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派代表”。曾国藩形象演变的历史轨迹表明，历史书写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本质上是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认知，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与知识话语体系的变迁。

关键词 曾国藩形象 历史书写 知识生产 权力 话语

作者李稳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7）。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6-0205-12

曾国藩（1811—1872）乃中国近代史中备受关注且极具争议的典型人物，对其评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论题。百余年来，不同政治与文化派别对曾国藩的评价大相径庭、褒贬各异，成为管窥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一扇窗口。章太炎曾言：“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①曾国藩逝世后，清廷追封谥号“文正”以彰其功绩；其门生故旧及幕府人物将其推上清朝“中兴第一名臣”“清代第一流人物”的高位。如薛福成将其比作“司马光、诸葛亮之流”，容闳视其为“完全之真君子”。然而，曾国藩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在翻转，甚至两度在社会上引起学习曾国藩的热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告别革命论”的出现及“阶级分析方法”的淡化，曾国藩的形象开始被过度美化，以至于出现“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的流行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关于曾国藩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民国时期即有学者关注到曾国藩的形象变化，20世纪90年代也有学者简要提及这一现象，但尚未有专题性的系统深入研究。^②近来有学者从革命思想的延续视角探讨章太炎和范文澜对曾国藩的批判，推进了相关研究。^③不过，近代以来曾国藩的形象由褒到贬、再由贬到褒、再到褒贬不一的历史转变过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尝试从长时段的视角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曾国藩形象的演变与历史书写，反思其多重话语背后折射出来的政治与思想问题，借此丰富人们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认识。

- ① 章太炎：《馘书（重订本）·杂志》，朱维铮校点：《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5页。
- ②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徐泰来、罗绍志主编：《学者笔下的曾国藩》，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何翰屏代序，第7—8页。
- ③ 王锐：《章太炎与曾国藩形象在近代的翻转——兼谈范文澜的曾国藩论》，《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一、“汉奸”：清末民初革命者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

晚清时期，曾国藩一直被清朝统治者及其门徒树立为道德楷模而受到顶礼膜拜。正如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言：“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①然而，随着满汉冲突的加剧，革命党人出于反帝排满的政治需要，开始热烈歌颂太平天国运动，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②对处于革命对立面的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等人则大肆挾伐。由此，曾氏完美正面的楷模形象逐渐受损。

清末革命党人章太炎是当时激烈批判曾国藩的代表人物，“开启晚清以降批评曾国藩之先河”。^③他在1906年于日本出版的《馥书（重订本）杂志》一文中对曾国藩进行了评价：“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词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未尝建言持国家安危，诚笃于清室之宗稷者邪？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死三十年，其孙广钧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④在此，章太炎指出了时人对曾国藩的两极化评价——“圣相”和“元凶”。此时的章太炎政治立场已发生变化，由“尊清”转变为反清，由宣传社会改良转向提倡民主革命。为了排满的政治需要，他更偏向于贬低曾国藩，认为曾氏醉心功名、渴望声誉、利欲熏心，为追求高官厚禄，不顾民族大义，虽在地方办团练、建湘军，竭力扶持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但并未真正挽救危局，还为子孙后世留下“民贼”的骂名。^⑤

出于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排满思想，章太炎对曾国藩破坏汉人的风俗习惯也予以抨击：“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剃。”^⑥他还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批判曾国藩的洋务行为：“满洲人既与汉人殊种，曾国藩者，渴于富贵，以造鸱枭破镜之逆谋，既徂大戾，始效泰西船械以自封。”^⑦可见，章氏指责作为汉人的曾国藩不顾民族大义，毅然充当满族统治者的帮凶和工具，为追求个人财富不惜向西方侵略者学习造船技术，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过，章太炎在前期对曾国藩于清廷的地位评价较低，认为“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⑧在章太炎看来，曾国藩虽助力清政府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但也不过是获得“虚名之内阁”，并未真正参与到清王朝的高层机密，仅靠献媚于清廷以保全自身的官位，不像福康安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后立马获得“贝子郡王之赏”，由此体现曾国藩并未真正得到清廷的重用。章太炎在《逐满歌》中更是赤裸裸地指责曾国藩的“汉奸”身份：“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⑨曾担任梁启超秘书的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也曾感慨出身于江浙士绅家庭的章太炎为何如此贬低曾国藩，原因是章“以浙中旧儒，身赞革命”，因其“飭迹清为建虏”，故谓曾国藩为“大盗”。在李肖聃看来，章太炎之论“亦奇诞矣”。^⑩不惟如是，章太炎及其他革命党人在《民报》发表了系列批判曾国藩和清政府的文章。如1907年《民报》上发表一幅丑化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图像，三人头像分别被附着在三种不同的动物身上，以示侮辱。^⑪章氏门生黄侃在《哀太平天国》一文中极力表彰洪秀全英雄行为的同时，用“为满作贼”来贬低曾国藩的镇压活动。^⑫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等译，钟叔河导读、标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63页。

②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③⑤ 王锐：《章太炎与曾国藩形象在近代的翻转——兼谈范文澜的曾国藩论》，《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④ 章太炎：《馥书（重订本）·杂志》，朱维铮校点：《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5页。

⑥⑧ 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96、197页。

⑦ 章太炎：《馥书（重订本）·消极》，朱维铮校点：《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11页。

⑨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2页。

⑩ 李肖聃：《星庐笔记》，绛希点校，长沙：岳麓书院，1983年，第101页。

⑪ 《过去汉奸之变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图画）》，《民报》1907年增刊卷，第1页。

⑫ 黄侃：《哀太平天国》，《黄季刚诗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74—675页。

因太平天国被定性为民族革命，故革命党人多利用宣传太平天国来批判曾国藩。辛亥元老刘成禺（署名汉公）所编《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于1906年在东京出版，5年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亦是从革命者的立场和视角撰写的史书。此书是由孙中山提议撰写，并由他亲自为之作序，开篇即将洪秀全与朱元璋相提并论，谓“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所不同的是，“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自古“以成败论豪杰”，洪秀全之失败引起孙中山之同情，加剧了其对政局的不满，认为“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便是士大夫内趋炎附势的存在，“虽以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①可见，孙中山认为曾国藩缺乏民族主义思想，“终不明春秋大义”，清廷借助湘军等地方势力“以汉攻汉”，以致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民族革命惨遭失败。《太平天国战史》一书的指导思想是“神圣洪杨，盗贼曾左”。刘成禺在书中多次将曾国藩称之为“虏臣”，暗示曾氏如清朝大将温邵原一般，“不能明效忠本族之大义”，从而导致“满人非能亡汉，汉人自亡之”，并嘲讽其为献媚于清朝满族统治者的“汉奸”。另一方面，他又为洪秀全“奄有江左”而未能联合外国势力共同驱赶清朝统治者感到惋惜。^②革命党人刘成禺虽未直接点名曾国藩，但已暗示其为“汉奸”“民族罪人”。可见，清末革命者贬低曾国藩的底层逻辑仍是政治立场和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

不过，就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批判曾国藩为“汉奸”“民族罪人”的同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比如维新派梁启超便对曾国藩甚为推崇，谓：“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③个人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常常会不自觉地夹杂着自身的政治立场，清末梁启超是君主立宪制的鼓吹者，其推崇明君，自然渴望“贤臣”，故对“治世能臣”曾国藩评价甚高。

民国建立后，新生国民党政权的身份和目标均发生变化，即从“革命者”转为“建设者”，从“造反”转为“安邦”，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和现实需求逐渐增强。因此，伴随新生政权革命立场的转变，曾国藩的形象也悄然发生改变，逐渐由负面的“民贼”转为正面的传统文化集大成者。这从章太炎后期态度的转变可见一斑。1914年，章增删《诂书》，更名《检论》，对曾国藩做出诸多新评价。如他在东京与宋教仁谈论时，谓：“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末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迹，则上度皇甫规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④可见，章太炎此时态度已发生较大转变，不再将曾国藩视作“汉奸”，反而开始肯定其成就不世之功的贡献。

二、传统文化“卫道士”：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曾国藩形象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内部开始有意推崇曾国藩，以其为治军训属、立身行事之模范，谓“自洪秀全覆灭，国人莫不乐道曾、胡。清末革命党以排满相号召，乃于曾、胡辈无怨词。近岁，则党国要人始复以曾、胡相勸励，并引为治军、训属之范例……《曾国藩家书》亦甚为时贤所称许，谓吾人立身行事，可资师法。凡此之属，屡见于报纸记载，不遑备举”^⑤。至30年代初，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尤其是知识分子极力追捧曾国藩，大量关于曾的事功、言论和思想的书籍应运而生。由此，曾国藩的负面形象逐渐被淹没，儒家传统文化“卫道士”和“内圣外王的完人”再度成为其标签和名片。^⑥

① 汉公编：《太平天国战史》（前编），孙中山序，上海：中华书局，1911年。

② 汉公编：《太平天国战史》（后编），第17、76页。

③ 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3页。

④ 章太炎：《检论·对二宋》，朱维铮校点：《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00页。

⑤ 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一），《国闻周报》（天津）1929年第6卷第26期。

⑥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早在20年代初,即有学者以“了解之同情”的治学方式对曾国藩做出相对正面的评价。吕思勉在1922年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一书中认为,咸同之际“民族的自觉,势力颇小。而君臣之义,颇有势力”,曾氏生平带有浓厚的“君臣之义”思想,不宜用“民族主义”的思想来质问他为何要做“满洲的奴隶”,“推翻王室,改良政治,这件事,在大家都抱着君主思想的时代,谈何容易办到。况且曾国藩等,何尝知道彻底改良政治来。以练兵造船……为自强,正是这班中兴名将的政策”。^①这套中国通史几经出版,在当时产生较大的影响。吕思勉是“新史学”最早的接受者和实践者,他对曾氏的评价或许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同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及曾国藩的事功时,不无感慨地谈道:“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他的中兴事业虽然“光荣灿烂”,“可惜都没有稳固的基础,故都不能有长久的寿命”。清朝的命运走到太平天国之乱的节点,“一切病状一切弱点都现出来了”,而曾国藩一班士大夫“居然能平太平天国,平定各处匪乱”,做成中兴之业,实属难得。尽管这使满清延续了五六十年之久的国运,究竟救不了腐败的满清帝国走向灭亡之途。而曾国藩在“文学上的中兴事业,也是如此”。^②可见,胡适虽认为曾国藩的事功与文学根基难以长久,但整体上对其持肯定态度,肯定其挽狂澜于即倒的历史功绩。柳诒徵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引用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的观点,谓:“世谓湘军之精神,在维持名教”。^③换言之,柳氏认同稻叶君山的观点,认为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并非维护满清王朝,而是出于维护儒家传统文化,二者之间是一场宗教之争。不过此时,曾国藩翻转成为正面的“卫道士”形象还主要停留在知识分子层面,尚未引起社会上的关注热潮。

胡适在当时被青年人视为偶像,他本人及其他知识分子对曾国藩形象的重评,很快引起舆论界瞩目。20年代末,新闻媒介也加入对曾国藩的正面形象宣传行列。1929年,作为“报界三杰”之一的徐凌霄接受《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的邀请,撰写清末民初掌故,其与兄长徐一士在《国闻周报》共同发表《曾胡谭荟》系列文章,讲述曾、胡故事,意在为曾国藩鸣不平,谓:“良以胡曾诚有大过人者,无间今昔也。至其未明民族大义,自是时代使然。曩日中国智识阶级,讲天下主义,不讲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于其‘民族主义第三讲’中尝详言之,吾人固不必以此苛责曾胡矣。”^④在徐氏兄弟看来,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所指责的曾国藩“不明民族大义”是由于时代所限,并非曾、胡个人之过,呼吁民众不要过于苛责曾国藩和胡林翼。他们认为洪、杨标榜西教,毁弃名教,破坏文化,引起士人阶层极大愤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除传统的忠君思想外,“更有名教与文化之关系”,且当时“君臣一伦,自亦在所谓名教之中”,^⑤即曾国藩是出于维护“名教”,维护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即使存有忠君思想也无可厚非,毕竟“君臣一伦”也在名教范围之内。他们在序言最后还明确指出,《曾胡谭荟》系列文章旨在“使读者对曾胡有较亲切之认识”。

实际上,早在北伐时期即有人将国民党蒋介石比附为曾国藩:“蒋介石、唐孟潇之携手北伐也,谭组庵贻书唐氏,谓蒋介石为今之曾涤生,愿君以胡润之为法,以收和衷共济之效。”1929年4月18日,蒋介石在汉口对所部训话时,曾有“曾胡治兵语录不可不读”之语。^⑥曾胡作为当时国人的精神典范,蒋对其道德修养、人格精神推崇备至,处处加以效仿,多次在日记中高度评价曾国藩。^⑦他指出:“曾胡一般先贤,他们当时救国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提倡中国固有的道德——就是孔孟之道,其所倡导的就是一种‘忠诚朴拙’的人格。”^⑧蒋介石虽然接受近代新式军事教育,但在其思想内核之中,儒家文化仍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其逐渐接近权力高峰的过程中,更为推崇曾国藩这类治世能臣、忠臣,以便为其辅佐效力。由

① 《吕思勉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57页。

② 《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9—260页。

③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19—1321页。

④⑥ 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一),《国闻周报》(天津)1929年第6卷第26期。

⑤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汉阁谈荟 曾胡谈荟》,徐泽昱、徐禾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23—424页。

⑦ 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36页。

⑧ 蒋介石:《军训之目的与救国的基础》,《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36—1937年,第241页。

此可见，追捧曾国藩现象背后，与国民党的推动不无关系。

30年代以后，儒家传统文化的“卫道士”甚至成为曾国藩的主要身份标签。1930年，典型的文化主义者陈训慈在《太平天国之宗教政治》一文中专门反驳曾国藩“甘为满洲之奴隶者”一说，认为持这种说法的人“未明曾氏出兵之意义”，伦常破坏、孔孟之传统精神扫地较外族统治更为严重。因此，曾国藩“殆为人伦名教而战，而非徒为清室而战。湘军亦非一姓之军，而有如主义之军矣”。^①作者再次强调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是为维护名教，为保护儒教传统文化而战。1932年11月，郭斌稣在《大公报》发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高度肯定曾国藩在道德、文章、事功等方面的贡献，赞扬其保卫中国传统文化之功绩，云：“中国近三百年中值得吾人崇敬之人物，当推曾文正公……文正之荣，亦中国文化之荣……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觐。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②可见，郭斌稣认为曾国藩是德才兼备、文武兼具的伟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标签和文化符号。

毋庸置疑，国民党高层对30年代“曾国藩热”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1933年5月，蒋介石效法曾国藩，在南昌编练团队，成立赣省保卫师，以期肃清共产党。^③次年2月，他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主张以儒家文化的“四维八德”为宣传口号，重建传统，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由此，曾国藩的文化价值和热度再次被提升。国民政府官员李朴生在《曾国藩的用人方法》一文中指出传统儒家文化对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性：“曾国藩时代可以捧出孔子号召群伦，征讨‘发逆’，我们要如法炮制。”^④面对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的挑战，国民党高层认为要尊孔读经、重揭儒家传统文化的大旗，以抵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蒋星德在1935年出版的《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一书中直言，曾国藩之所以被迫捧，很大程度源自“‘共匪’的骚扰，和国民道德的低落”。正因如此，“最近的风气似乎改变了，被遗忘的曾国藩，最近又似乎慢慢引起国人的注意了”。^⑤李鼎芳、张荫麟在《曾国藩及其幕府》一文中赞赏曾国藩的“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性情足以近人”，“按他的时代的标准去衡量，他可是一个并世无两的伟大领袖”。^⑥在他们笔下，曾国藩作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代表的文化价值再次凸显。国民党高层的介入与推动，加之知识阶层和新闻媒介合力为其辩白和宣传，曾氏已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这一时期，学界不仅整理出版曾国藩的奏稿、日记、信札和诗文等，《曾文正公全集》也一版再版，另有多部专门研究曾国藩的传记，以为其正名。1936年，胡哲敷在《曾国藩》一书中谈到湘军与太平军之战时，对曾国藩有这样的评价：“他始终不懈，为的就是要保持名教，恐怕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是曾氏的心迹。是故湘军初起之时，只在保卫乡土，后来便在维持名教。”作为传统文化“卫道士”，曾国藩为维护儒家孔孟之道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似乎合乎情理。即使到抗战爆发时期，国内知识分子仍秉持这种观点。何贻焜在1937年出版的《曾国藩评传》中继续为其缺乏民族思想而开脱罪责，认为曾国藩受“时代背景与家庭环境”所限，“观其所作檄文，兢兢以扶持名教”，效忠满清

① 陈训慈：《太平天国之宗教政治》（下），《史学杂志》1930年第2卷第1期。

② 郭斌稣：《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1月7日，第8版文学副刊。

③ 《效曾国藩编练团队》，《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5月29日，第3版。

④ 李朴生：《曾国藩的用人方法》，《行政效率》（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7页。

⑤ 蒋星德：《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第6版，“编者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⑥ 李鼎芳、张荫麟：《曾国藩及其幕府》，《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5月24日，第11版史地周刊。

政府亦并非他本意，并赞同前辈学者所说“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如宗教军”的观点。^① 1938 年，秉持民族革命史观的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一书中也认为：“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② 不过，萧氏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三篇文章《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论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再论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彻底为曾国藩摘掉了满清政府的“帮凶”和“汉奸”的罪名。^③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空前加强，满汉不再有畛域之分。萧一山即认为，满人与汉人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不应把满人看作异族压迫者，而应视为“同族”，“清人也和我们一样的是弱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共同的敌人是西方帝国主义，而曾氏发起的自强运动抵制了西方帝国的侵略。^④ 循此逻辑，曾国藩不再是缺乏民族主义的“民族罪人”，而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此外，国民党及部分知识分子为维护曾国藩传统文化“卫道士”的形象，从“外来文化邪恶论”的视角来肯定曾国藩“卫道辟邪”的重要“历史贡献”，进一步把曾国藩塑造为民族主义者。^⑤ 正如德国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施泰格（Brunhild Staiger）所说：国民党认为，“民族文化主义能够成为抵御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坚强壁垒。一旦出现用文化来表现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曾国藩，成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捍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⑥ 政治立场右倾的职业报人王德亮甚至专门撰写一部《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为其翻案，他在序言中指出，自己在 1940 年春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归来后，“重沐总裁熏陶，凜然有动于中”，受蒋介石的鼓舞而编著该书，目的是增强青年人的爱国思想，“旋拟对现在抗战之精神动员方面，有所靖献，因于公余隙，从事《中华民族御辱自卫文献》之编纂，以期读者感发兴起，同仇敌忾，加强战斗意志……使一般青年，获窥先民治丰功伟绩，而增强其爱国思想”。他在第一章极力为曾国藩镇压太平革命正名，并在其中罗列支持“湘军志在保卫乡里维持名教”这一说法的学者及其观点，赞扬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欲广布民族思想于社会”的行为，值得后人效仿。此时，曾国藩传统文化“卫道士”的形象已然成为国民党暗示、讽刺共产党不能救中国的靶子。王德亮在后记中说，三民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救中国之唯一主义者”，是因为它源自“中国固有思想与民族精神”，而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是“其所持之主义，不适合中国之国情”。^⑦ 由此影射同样信奉外来的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不能救中国。^⑧ 可见，国民党之所以将曾国藩塑造成传统文化“卫道士”，主要是出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维护其统治的政治需要。

诚然，尽管诸多知识分子都承认曾国藩是传统文化“卫道者”，但也不乏批判曾国藩者。如《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中指摘曾氏之罪状，将曾国藩视为“中国旧文化最后一个武装卫道者”，曾“挫折了中国的初期革命，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一言以蔽之，“由历史进化的眼光看，曾国藩绝对是一个反动的倒车”^⑨，呼吁民众应抛弃“两千年来正统与道统交叉控制之下的文化与思想”，不要迷恋复古。作者由此暗示，国民党对曾国藩传统文化“卫道士”的宣传只为争得正统与道统。此后，该文被各大报刊纷纷转载，由此引发与刘士笃、王德亮等人的论战。^⑩ 20 世纪 40 年代后，曾国藩的传统文化“卫道士”形象已然成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纷争的政治文化符号。

① 何貽焜：《曾国藩评传》，第 613 页。

② 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21 页。

③ 萧一山：《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汉口大公报》1938 年 10 月 16 日；《论近代中国民族革命》，《重庆时事新报》1938 年 11 月 27 日；《再论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重庆大公报》1938 年 12 月 11 日。

④⑥ 施泰格：《民族主义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太平天国学刊》第 5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67、65 页。

⑤ 方之光、袁蓉：《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历史启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⑦ 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年，自序第 1 页、后记第 1 页。

⑧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⑨ 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四），《大公报》（天津版）1945 年 12 月 12 日，第 3 版。

⑩ 刘士笃：《我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看法》（上、下），《中央周刊》1946 年第 8 卷第 8 期、第 9 期；罗正伟：《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战斗中国》1946 年第 2 卷第 1 期；宋亮：《曾国藩的新评价》，《建政月刊》1946 年第 2 期；俞颂华：《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为什么他对诸葛亮和曾国藩有严酷的批评》，《人物杂志》1946 年第 4 期；王德亮：《批评之批评：与王芸生论曾国藩》，《中央周刊》1948 年第 10 卷第 40 期等。

三、“汉奸刽子手”：马克思主义史观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再翻转

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全新的话语体系与分析视角，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观察分析历史与社会现实，阶级分析方法逐渐成为共产党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论。抗战后期，国共两党关系日益恶化。面对国民党对曾国藩传统文化“卫道士”形象别有用心地塑造与宣传，共产党人也开始予以反击，以阶级分析方法旗帜鲜明地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猛烈批判代表旧思想旧文化的曾国藩。

20世纪30—40年代，国民党御用文人不断将蒋介石宣传比附为曾国藩，甚至呼吁中国需要“第二个曾国藩”^①。面对国民党利用传统儒家文化来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挑战，1943年7月，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从人民的立场、革命的视角予以反驳：“中国从来显然有两种文化传统思想：一种是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国一开始时候，太平天国与孙中山就是代表前者，曾国藩及现在中国的一切反共反人民分子就是代表后者。不管太平天国与外国思想（自由平等博爱），却是真正代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英雄；不管曾国藩满口旧中国的仁义道德（五伦五常），却仍是双重的奴才！满奴才和洋奴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从来以至洪秀全、孙中山一切优良的革命的传统，而一切反动派则继承曾国藩、叶德辉的传统。反动派想取消前一种传统，保留后一种传统，而我们则正相反。关于中国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分别，就在这里。”^②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真正的革命，即使接受了外国的思想也是真正代表中国人的革命，而处于对立面的曾国藩就是反动派，由此暗示共产党虽然信奉外来的马列主义，但却真正继承了中国的革命传统，而国民党蒋介石则是继承了曾国藩儒家文化的反革命传统。此时，曾的形象逐渐从正面的儒家文化“卫道士”再次翻转为负面的反革命人物。

镇压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政治生涯中的里程碑，评价曾氏多少会涉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正如冯友兰所言：“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须否定太平天国。”^③无形中，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已成为“圣魔两立”、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标准。实际上，早在20年代初即有知识分子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对太平天国进行评价。毛泽东在1926年3月18日发表的《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地主压迫农民的阶级斗争：“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④30年代，部分学人围绕阶级斗争理论出版两本太平天国史著作，如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和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1933），这两本书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从经济角度分析太平天国发生的时代背景、革命原因、革命性质、双方阶级成分及革命失败原因。如张霄鸣认为曾国藩出身于富农家庭，他的经济地位“已经决定是反革命的，又加之他是秉承祖训的贤孙。他是迷信孔孟之道，尊崇朱陆之学（朱陆是继承孔子而更加注重束身忠孝之学），他是相信宗法礼教制度最深的人物”。在其看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是“保护桑梓，实际上就是保护地主商人和富农的优裕统制地位”，通过保护这些拥护清政府的地主富农阶层而得到自身的荣光。^⑤但由于史料不足、史实有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评价曾国藩的李一尘和张霄鸣也被称之为“史观派”。之后学界出版多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南的太平天国史著作，他们均从阶级对立的视角批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如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

① 子路：《社会动态述评：需要第二个曾国藩》，《社会评论（长沙）》1948年第64期。

②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21页。

③ 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89年第7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⑤ 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第156、158页。

动史》(1937)、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1937)以及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1944)等。^①

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是猛烈批判曾国藩的典型代表。1944年7月,他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令曾国藩“汉奸刽子手”的形象深入人心。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刊出单行本。范文澜在1947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解释了该文的写作背景及目的,旨在揭穿国民党过分追捧、美化曾国藩的阴谋,明确指出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中国人民熟悉曾国藩的一套把戏,对提高政治警惕性是不无帮助的。因此把他的一生罪状写成专篇,作为本分册的附录。”^②他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卷首影射国民党树立曾国藩这个典型是反革命的行为,已然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传统,认为关于曾国藩的争论是“一个特别尖锐的标本”。国民党元首孙中山“拥护洪秀全、反对曾国藩”,不仅自称为“洪秀全第二”,甚至“痛骂曾国藩辈的‘以汉攻汉’的汉奸行动为‘廉耻道丧,莫此为甚’”;然而,“现在大后方的一切反动统治人物却以祖先崇拜的虔诚来供奉曾国藩,把曾国藩的著作大量翻印来作为他们训练干部麻醉青年的教材,对于太平天国的宣传则加以限制和禁止,譬如关于李秀成的戏剧即被禁演”,范文澜认为国民党“这种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公然的反叛,当然是他们整个地背叛革命三民主义的逻辑结果”。^③从上可知,范文澜对曾国藩的批判及其历史叙事与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态度一脉相承,均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攻击,批判其缺乏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帮凶”。

不惟如是,范文澜对曾国藩所精通的程朱理学也进行严厉批判,认为他所谓的儒家文化“四维八德”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他们维护的是地主阶级和大官僚阶层的根本利益:“他精通极端专制主义也是极端奴隶主义的哲学——程朱道学,运用在言论上,就是满口‘诚’‘礼’‘仁义’‘道德’等字样,运用在行动上,就是极度的残忍,屠杀数千万中国人民。……说是‘卫吾道’,所谓‘道’,只是少数大地主大官僚的‘道’,从人民看来,恰恰是大逆不道。”^④显然,曾国藩不仅是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也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同时,他还指出曾国藩在处理完屈辱的天津教案后,被全国民众“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诛”。^⑤说到底,范文澜对曾国藩言辞激烈地批判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和政治目的,表面上是为了暗示、讽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实际背后所直指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近代官僚问题,从而揭示近代历史发展动力的新认识,即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革命才是正道,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有助于解决时代危机的。此后,曾国藩“汉奸”“卖国贼”的负面形象再次成为国内历史学界的主流话语。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逐渐占据国内史学理论的支配地位,也有学者对利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太平天国提出质疑,^⑥但曾国藩作为“汉奸刽子手”的负面形象几乎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

从毛泽东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阶级定性,到众多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曾国藩的剖析,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深入运用。这一时期曾国藩形象的再翻转,不仅是学术观点的交锋,更是不同政治力量、历史观的碰撞,深刻影响了国内史学界对近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知。虽有对研究方法的质疑,但曾国藩的负面形象仍长期主导史学话语,成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注脚,也为后世反思历史、汲取经验提供了丰富素材与深刻启示。

四、“他者”之思:海外学者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

论及曾国藩形象,眼光很难不聚焦于海外学界。晚清以来,中国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巨大冲击。作为

①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延安解放社,1937年;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上海:上海真理出版社,1937年;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重庆:中华正气出版社,1944年。

②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上海:中华书店,1947年,第2页。

③ 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出版者的话”,延安:新华书店,1944年,第1页。

④⑤ 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第33—34、33页。

⑥ 如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第46页)一书中严厉批评唯物史观与经济命定论,认为将太平天国视为经济性的阶级斗争过于武断,易被反驳。

倡导洋务运动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首领，曾国藩也受到海外学者的长期关注。最早关注曾国藩的是在华传教士，如卫三畏、丁韪良等，他们在《中国丛报》《华盛顿邮报》等十多家报刊媒介上发表对曾氏的评价。^①之后，西方学者逐渐摆脱传教士的立场和观察视角，对其进行专业的史学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曾国藩在“他者”眼中的形象有所变化，总体上更偏向于爱国忠臣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实践者。

海外最早对曾国藩进行专业性研究的或许是日本学者紫山川崎三郎，他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作为随军记者到过中国，对晚清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做过颇为深入的研究。他在1903年撰写的《曾国藩传》一书中将曾国藩称之为“东方的华盛顿”，认为其功绩可与美国华盛顿、德国俾斯麦以及意大利加里波第等人相提并论，虽然曾国藩与他们性格各异，“但就其格局和人格而言，绝不在他们之下，不会居于第二流的经世家”，他在书中对曾氏评价甚高，“若论理想之崇高，品行之高洁，器宇之宏阔，胸襟之极度光明，曾国藩与华盛顿正在伯仲之间”。^②可见，紫山川崎三郎从政治军事层面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维护清王朝统治的赞赏有加，这与同一时期国内革命党人对曾国藩的激烈批判形成鲜明对比。

20世纪以来，曾国藩在海外学者眼中主要有两种形象：一是维护国家统治的爱国忠臣，二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实践者。这两种形象时而分开，时而纠缠在一起，合二为一。如西方学者濮兰德和巴克斯在《慈禧外纪》中评价：“曾国藩是哲学家中一位具有英雄行为的人物”。不过，“这种英雄行为是由带有各种弊病的儒家学说体系屡屡训练出来的，而且以后还会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利益不断训练出来”。尽管如此，“在中国杰出人物中，曾氏仍然名列前茅，用忠诚的明智的爱国主义这个家喻户晓的同义词来描述他是恰如其分的”。^③在此，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即曾国藩既是传统文化的实践者，也是忠于国家的爱国者。美国学者黑尔（Hail W. J.）也持这种观点，他在1927年博士论文中指出曾氏的功劳在于避免国家陷入四分五裂。^④他进一步解释到，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成功，中国或许会陷入分裂或更多纷争，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则保全了国家的完整，因此，“他是忠诚于服务对象的仆人曾国藩，实践孔子理想的巨人曾国藩”。^⑤可见，黑尔与同时期国内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迥然不同，将曾氏与美国领导独立战争的开国元勋华盛顿相提并论，完全肯定其维护清王朝的忠诚。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并非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是为维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如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一书中指出：“湘军非勤王主义……意在维持名教，其最终之目的，即恢复异宗教之南京是也。是故湘军可称为一种宗教军”。^⑥换言之，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之间是一场宗教或文化之战。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较大反响。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国内学者积极引用这些观点，用以证明曾国藩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显然，与同时代国人相比，海外学者对曾之印象更加“正面”，不乏褒赞之词。

20世纪50年代后，海外汉学的重心由欧洲逐渐移至美国，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主要关注的议题是晚清时期中国士大夫阶层如何回应西方的冲击与挑战。随着研究视角和范式的转换，尽管海外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很高，但也开始批评曾国藩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顽固坚守。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邓嗣禹在1954年出版的《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一书中认为，曾国藩是“风采盖世的领

① 范丽娜：《美国学界的百年曾国藩研究》序，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年。

② 紫山川崎三郎：《曾国藩传——日本人眼中的曾国藩》，王纪卿译，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27—28页。

③ 濮兰德、巴克斯：《慈禧外纪》，1910年，第64—65页，转引自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刘北成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④ 黑尔：《曾国藩传》导言，王纪卿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页。最初版本请参见 W. J. Hail, *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

⑤ 黑尔：《曾国藩传》，王纪卿译，第238页。

⑥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卷），但焘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84—685页。日文本问世于1914年，同年但焘中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袖和儒家治道的化身”，“典型的儒臣，对清朝天子始终忠心耿耿”，^① 尤其是他将儒家文化与近代化军备相结合的做法“开启了此后数十年的风气，但用于近代国际政治后成效不彰”。^② 可见，费正清等海外学者从总体上肯定了曾国藩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功绩，但认为美中不足的是曾氏过于坚守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美国学者芮玛丽（Mary C. Wright）亦是如此，她在 1957 年出版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一书中将曾国藩称之为同治中兴之际的“时代豪杰”，“无可争议的伟大统帅”。在她看来，作为保守派领袖的曾国藩，在带领传统士大夫阶层重塑中国社会信仰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时人前所未有的普遍尊敬。但从近代化的视角而言，儒家社会秩序稳定性的要求与革新技术的近代化目标却背道而驰。由此，儒家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③ 1958 年，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焦点也是“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没有以工业化为背景的西方势力入侵，中国不可能实现近代化转变。^④ 《剑桥晚清史》一书也将清廷自上而下对改革、创新的拒绝和排斥，都归结于儒家传统文化的顽固抵抗。^⑤ 可见，在西方研究者的笔下，曾国藩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应对西方冲击的保守派代表人物。

20 世纪 60、70 年代，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受到学界质疑，学者们开始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近代中国发展的动力。谢正光（Hsieh Andrew Cheng-kuang）在 1975 年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曾国藩——19 世纪的儒将》中论述了曾氏的儒家思想渊源，认为儒家传统思想对其军事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⑥ 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 1980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一书中肯定了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曾氏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湖南人的知识振兴”。^⑦ 主张“中国中心观”的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也承认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大将在军事和外交方面所作出的改革贡献，但他不同意芮玛丽所说的“近代化与建立稳定的儒教秩序根本上水火不相容”是同治中兴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是由“当时大部分中国改革者不愿意（或不可能）理解近代化对他们自认为已经熟知的老问题有何关联，能起何作用”所致。^⑧ 由此可见，在柯文看来，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改革者并不是抵抗西方冲击的顽固派，而只是将关注重点放在国内、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了解有限的儒将。

21 世纪以后，海外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仍以“中兴大将”及儒家文化实践者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书中延续前辈学者对曾氏的评价，认为他是同治中兴时期最有力的汉人官员，^⑨ 相较于相对务实的李鸿章，曾氏是儒家理想主义者。尽管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大将积极推动洋务，但罗威廉认为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几乎或完全没有进入

① 费正清、邓嗣禹：《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年，第 81 页；Ssu-yu T'eng, J.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② 费正清、邓嗣禹：《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第 88 页。

③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刘北成校，第 92—94、240—311 页。

④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⑤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80—1911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57 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John K. Fairban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⑥ Hsieh Andrew Cheng-kuang, *Tseng Kuo-fan, A Nineteenth-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5.

⑦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98 页；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⑧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6 页；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⑨ 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李仁渊、张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 181 页；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Belknap Press, 2009.

工业化”。^①在他看来，曾国藩并未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作出多大贡献。可见，曾国藩的形象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仍维持忠心于清王朝的中兴大将及儒家文化实践者的形象。日本学者岡本隆司在2022年出版的《曾国藩：“英雄”と中国》一书，从英雄史观的视角探讨了曾国藩在晚清时期呈现的英雄形象。^②可见，海外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与国内学者复杂多元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者”的身份立场、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研究范式使其超脱于民族文化的束缚，较国内史学家更敢于作出大胆而自信的判断。

实际上，不论“冲击—反应”模式还是“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路径，曾国藩在海外学者眼中的爱国忠臣和传统文化践行者的形象多在细微之处加以区别，几乎未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学者们各有偏重，或强调他维护儒家传统文化的一面，或注重他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一面，或将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尽管也有学者批评他坚守儒家文化传统导致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延缓，但整体而言，海外学者眼中的曾国藩基本是积极正面的形象。从“他者”的角度看曾国藩的形象演变，可为我们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观察视角，进一步丰富、拓展研究的面相。

结语

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国藩在不同史观的叙事体系之下呈现出褒贬不一的复杂形象。政治人物面孔多元并不稀奇，但曾国藩作为与晚清甚至民国史粘连甚深的历史参与者，其形象的多变已不能算是单纯的个体复杂性问题，而是深度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与知识话语体系的变迁。

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因排满反帝之政治诉求，猛烈抨击曾国藩为维护清朝统治的“盗贼”与“汉奸”。20世纪30至40年代，曾国藩的形象再次出现翻转、再翻转。国民党试图通过塑造曾国藩传统儒家“卫道士”的正面形象，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巩固其统治合法性；而共产党则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武器，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批判曾国藩，从而争夺思想文化阵地，彰显自身继承中国革命传统的正统性，由此国共两党展开一场关于思想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博弈。而海外学者基于其独特的立场、价值观与知识结构，在曾国藩研究领域形成了差异化的学术切入点。由于置身于不同的政治环境与文化脉络之中，他们较少受到中国本土政治斗争的直接干扰，得以从更为宏观的中西比较视野出发，对曾国藩的历史角色进行审视。这种研究视角突破了本土研究的局限，为曾国藩研究注入了跨文化比较的学术维度。然而，在肯定海外研究独特价值的同时，亦需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东方主义倾向，尤其在早期研究成果及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著作中，这种倾向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刻板化标签认知模式。早期西方汉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常将曾国藩简单归结为“儒家保守主义者”或传统“卫道士”，片面强调其思想中的保守性，而忽视其在洋务运动等改革实践中主动学习西方技术的积极作为，这种认知模式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停滞”的刻板印象；二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部分研究受费正清“冲击—反应”理论的影响，将曾国藩推动的现代化进程解读为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刻意弱化中国社会内部自发的变革动力，隐含“西方启蒙东方”的价值预设；三是文化他者化建构。通过强调曾国藩的“异质性”（如镇压太平天国的“儒家道德”与西方宗教的对比），将其塑造为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他者”，这种研究路径本质上仍是以西方价值体系作为衡量标准。从学术史角度观之，曾国藩形象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中犹如一面多棱镜，在不同政治话语与学术范式的映照下折射出多元且复杂的面相。这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认知差异，不仅反映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多维性，更揭示了历史书写过程中研究者立场、价值观、理论框架对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实为革命史叙事、传统史学叙事与现代性叙事三种话语体系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现代性叙事凭借其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阐释与时代契合性，在曾国藩研究的学术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学术话语权的动态演变、知识生产模式的持续革新以及不同学术共同体间的理论争鸣，三种历史叙事的影响力亦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这种学术现象折射出历史研究中多元话语体

① 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第190页。

② 岡本隆司：《曾国藩：“英雄”と中国》，東京：岩波書店，2022年。

系的张力与博弈，同时也揭示了历史书写的主观性、时代性及学术研究范式的演进规律。曾国藩形象演变的历史轨迹表明，历史书写并非客观事实的镜像投射，而是在诸多因素交互影响下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其本质乃是书写者基于自身立场、价值观、知识结构及现实诉求，对客观历史展开的主观认知活动。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甚至发展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意味着历史的每一段时期都不单纯由客观事物所塑造，而是通过思想的解读、转化和再创造来呈现，揭示出历史书写的时代性与思想性特征。英国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进一步指出，历史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常因权力关系影响而被重新诠释与编排，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均试图通过重塑历史认知巩固自身话语合法性，^① 此过程凸显了历史书写中知识与权力的深层互动。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名的论断：“权力的运作不断地制造出知识，反之，知识亦不断引发权力产生新的效用。”^② 权力对知识具有生产、分配、审核与遮蔽等作用，而知识亦成为权力主体强化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通过文化、语言、宗教等符号系统构筑一套“看似公平”的政治话语与认知体系，将符合自身统治需要的价值观念逐渐渗透至社会肌理、内化为大众“常识”，以润物细无声地隐蔽方式重塑社会文化生态与集体思维模式。这种“常识化”的共识建构，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形象的历史流变，恰为剖析知识与权力互动关系提供了典型范本，亦为透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与知识话语体系变迁开辟了独特历史视角。

（责任编辑：周 奇）

The Evolution of Zeng Guofan's Imag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Modern Times

LI Wenwen

Abstract: Zeng Guofan was a renowned late Qing politician, strategist, and thinker, and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Zeng was portrayed as a “traitor” and “national sinner” who upheld the Manchu rulers by the revolutionaries from the nationalist perspective. In the 1930s, senior Kuomintang officials actively promoted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to legitimize their rule, and Zeng Guofan's image was once again constructed as the “defend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1940s, to counter the Kuomintang's motives in shaping and promoting Confucian culture represented by Zeng Guofan, Marxist historians re-adopted the historical view of national revolution from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once again criticizing Zeng as a “traitorous executioner” who suppresse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Uprising. In contrast, overseas scholars have evaluated Zeng Guofan differently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but generally tend to portray Zeng Guofan as a “gener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die-hard conservatives who safeguarde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Zeng Guofan's constructed image shows that historical writing has a certain selectivity, essentially being a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objective history, which indirectly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discourse systems.

Key words: image of Zeng Guofan, historical writ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power, discourse

① 凯斯·詹金斯：《历史的再思考》，贾士衡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② M.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1980, p. 52.